

文艺复兴与天主教*

童自觉

(常德师范学院 图书馆 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 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天主教之间,由于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和诸多的文化因素,不仅有对立和抗争,而且有传承乃至合作,不仅有变异而且有遗传,不仅有本质差别,而且有血脉相连。

关键词 文艺复兴;天主教;对立;传承;现实背景;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 :B976.1 ;K54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81(2002)02-0008-05

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进步的变革。它敲响了旧时代的丧钟,高扬起了向现代社会破浪疾进的风帆。在这场以思想解放为主旋律的新文化运动中,新崛起的资产阶级在古典文化的启迪下,用以人为核心的崭新的意识形态,反对以神为核心的陈腐的意识形态;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取代了以天主教神学为主导的封建主义旧文化;用对主客观世界及其关系的直接体验和深层次思考,打破了蒙昧主义对人的理性的桎梏。基于此,在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把天主教与文艺复兴绝对对立起来的思想倾向,认为在两者的关系中,只存在后者取代前者,并彻底否定和抛弃前者的绝对对立,而不存在后者对前者的扬弃,吸收其有用的东西为己所用的某种文化上的薪火传承;认为教会中人尤其是头面人物与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之间只有仇视和对抗,而无友谊与合作。

然而,随着有关文艺复兴史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纵深发展,越来越不可置疑地表明:文艺复兴运动与其锋芒所指的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如同世界上任何相互关联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一样,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是僵化的而是多变的,彼此间既有抗争、对立,又有传承乃至合作。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与教会上层乃至教皇间既有迫害与反迫害,也有依存、利用甚至深厚的个人情谊。天主教与文艺复兴之间既有变异也有遗传,既有本质差别也有血脉相连。

肇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其发展的全过程中,均显露与天主教割不断、理还乱的欢喜冤家之情结。

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被恩格斯誉为划时代的伟大人物的但丁[1](P269),他的不朽名作《神曲》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表现了西欧由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中,既反映了意大利的现实生活,表明了渴望祖国统一,要求理智解放,情感自由,肯定新思想和新生活的情怀,又打上了中世纪天主教世界观的烙印,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气氛,洋溢着对上帝的真诚向往,融人文主义精神和天主教神学观念、中世纪传统思想于一体。

如果说,但丁的跨时代性使他难以彻底与旧时代决裂,摆脱旧思想旧传统的影响,在开创文艺复兴新时代的同时,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势所难免,且不足为训的话。那么,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从意大利到英伦的所有人文主义巨匠,无一不是“既非不信教者,也非无神论者”[2](P208),大都拥有着非常坚定的天主教情结。甚至本身就是教会上层人士乃至教皇。

被尊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得拉克,不仅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研究古典文化的带头人,而且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人间真情,其追求个性解放、个人爱情和荣誉的激情洋溢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这同中世纪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彼得拉克不仅没有同天主教进行决

* 收稿日期 2001-11-15
作者简介 童自觉(1952-)男,湖南汉寿县人,常德师院图书馆副教授。

裂,而且还对教会表达了敬意。他在给友人博卡西奥的一封信中,在强调求知的重要的同时,将求知之路与无知之路并提,并指出在“虔诚”的引导下均可通向幸福[3][P6]。达·芬奇一生崇信实验科学,是文艺复兴中多才多艺“巨人”的典型代表,然而在他晚年卧病在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感到死亡,于是请人一遍又一遍讲解《圣经》中的教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虽然主张用理性来对抗宗教信仰的无上权威,用“人学”来取代神学,但是,其复兴或创新没有脱离中世纪西欧天主教文化的土壤。人文主义者的许多文学作品均借用了教会文学的隐喻、寓言或梦境等形式,在思想体系上也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天主教神学的支配,但丁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诗人塔索也是这样,他在其叙事诗《被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中通过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种思想文化的冲突和较量来显示天主教信仰的力量,表达其对天主教文化的依恋。即使其思想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局限,对早期资产阶级身上暴露出来的一些卑劣的自私品质进行过批判的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其作品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圣经》的影响,西方学者奇蒙·诺布尔就写有《莎士比亚的圣经知识》一书对此进行介绍。另一学者樊戴克通过数学统计明确指出,莎士比亚每一剧作引用《圣经》的平均次数竟达14次之多。

天主教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密切关系,除了表现在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与天主教有着难舍的缱绻之情外,还表现在天主教会乃至教皇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和直接参与。令人文主义者所倾倒和努力模仿的古典文化,主要来自于中世纪前期修道院所保留、抄缮和翻译的古希腊罗马文献。大批的学术人才、知识巨匠都是修道院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在文艺复兴运动的辉映下,在罗马教廷甚至还出现了尼古拉五世、庇得二世这样的人文主义教皇。第一个文艺复兴教皇尼古拉五世不仅自身是位第一流的学者,并且十分重视对古籍的收集和整理。当他还是一位普通教士的时候,就曾因购买手稿或请人抄写手稿而身负重债。成为教皇之后,他充分运用其权力和影响,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献,并最终为梵蒂冈图书馆的创办奠定了基础。受到伊拉斯谟人文主义者广泛批评的朱理亚二世,同样是当时最著名的艺术的倡导者[4][P208]。他把布拉曼特、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聚集在自己周围,决心使罗马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为实现这一夙愿,这位极其暴躁专横的“野蛮人”,对米开朗基罗这样

伟大艺术家也十分克制,极为笼络。正是由于他们对人文主义艺术的赞赏、宽容和扶持,使罗马取代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

总之,人文主义与天主教的结合,是文艺复兴运动得以兴起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不仅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经历了古典学者对于古代文学艺术的热情与更新的宗教思想,以及揉合古典遗产与基督教传统努力均衡发展的阶段,而且人文主义与天主教的相合,还是北欧国家(如德国)通往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的文化世界的第一座桥梁[4][P75],在整个文艺复兴和西欧近代文化的构建初期,天主教及其物化组织,作为保守、愚昧、阻碍文化发展的落后势力,遭到有识之士的批判的同时,又以曾经代表过的那个时代及其文化上的一切建树,与新生的近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对文艺复兴运动及近代西欧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有着无可置疑的重要影响。

二

文艺复兴与天主教这种血脉相连、声气相通的借鉴与传承关系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它有着深厚的现实背景和诸多的文化上的原因。

在文艺复兴时期,虽然天主教及其教会组织基本上维持着中世纪以来的格局,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兴起,社会的动荡和转型,教会从自身组织和教俗关系,从思想到行为上都必然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应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在不断发展社会中维系自身的存在,从而使天主教与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之间有了沟通的现实必要与可能。

在社会转型的变动时期,社会中的每一个阶级、组织,甚至每一个人都必然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作为中世纪西欧社会最大的封建主和剥削者,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均对封建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的天主教及其组织,理所当然的处于社会变动的漩涡的中心。为了不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巨澜冲击下陷入灭顶之灾,天主教利用其在时间上延续上千年,空间上遍及西欧各国,精神上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优势和顽强的应变再生能力,从各方面采取了适应社会转型的一系列措施,改变了中世纪那种崇尚独处深思和安贫禁欲的宗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世俗社会生活,对各种社会问题予以了更多的关注。首先,教会不断强化教俗两界宗教信仰的司法权。在文艺复兴时期,教会通过宗教裁判所

对具有异端思想的精英文化知识阶层进行迫害,烧死布鲁诺,囚禁伽里略,封杀哥白尼的学说。他们甚至对大众文化中蔓延的异端思想也不放过。但是,面对变化着的客观现实又不能视而不见,或者一味地进行打压。为了生存和发展,天主教会依仗其肌体的再生能力,向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进行了必要的妥协。尼古拉五世不仅为象征古典学术的梵蒂冈图书馆的创立殚精竭力,而且还决定兴建一座与新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建筑物——圣彼得大教堂[4](P102)。利奥十世甚至对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蓬彼尼奥·莱托所创办的充满了人文主义气息,并宣扬异教无害的罗马学园予以庇护,并使其臻于鼎盛。正是由于天主教会的因时、因世应变,不仅使天主教会没有在新时代巨澜的冲击下陷入万劫不复的灭顶之灾,而且使其与新的社会思潮人文主义有了相通之处。

教俗两界价值观念的趋向,也是天主教和文艺复兴运动联结的重要纽带。文艺复兴的经济前提就是商品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这一点在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意大利表现得尤为突出。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城市成了商业和金融业的中心,周围的中小城镇及广大乡村均被卷入巨大的商业贸易网。英国和低地国家的情形也如此。在这种巨大的新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天主教会所奉行的以自然经济为前提的传统价值观念无法坚持下去了。15世纪时,主张禁欲与安贫的法兰西斯派的圣徒伯尔纳迪诺也改变了观念,大肆推崇工商业,提倡通过商业使金钱和珠宝转作生产力用途,指出“有节制地享有繁荣是好事而不是罪恶,工商业有益于公众幸福”【5】(P1-37),这就从理论上肯定了商品经济发展中追逐金钱利润的价值观念。如果说圣伯尔纳迪诺只是主张“有节制地”享有财富的话,那么,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教会则走得更远,手段也更为繁多。教会利用俗人的宗教热情,尤其是一些忙于生意的工商业者没有充裕的时间参加宗教活动,便以教会捐赠钱物的方式加以补救的机会,尽可能多地获取财富。教会及其组织在社会现实的冲击下,价值观念的转变,对尘世物质利益的热心追求,不可不避免地表现在思想文化上对文艺复兴时期反映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资产阶级新文化——人文主义的认同。事实也是如此,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许多人文主义者就是教会培养出来的,甚至本人就是教会上层人士或者教皇。

信仰普遍的衰落和危机的深化,同样迫使天主

教会对宗教活动和宗教仪式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以各种方式适应世俗社会的普通大众,以图通过对世俗生活的认同、宗教的普通化和大众化来提高人们的宗教兴趣,维持对天主教的信仰。文艺复兴时期,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世俗思潮的冲击下,尤其是教会对尘世物质利益的贪婪追求,教士和修道士在宗教信仰上呈现出普遍的衰落。无论是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修士,还是在普通教区教士中,信仰危机再度表现出来和深化,其主要表现是:第一,教会在各方面的纪律较前大大松弛了,教士的素质下降,一些由教士主持的神圣仪式都草率从事。第二,随着教会纪律的松弛,教士和修道士在道德上的败坏和生活上的腐化愈加公开化。特别是一些高级教士的所作所为像世俗的封建领主一样,完全违背了《福音》精神,沉湎于世俗的行乐生活,不少教士贪婪无比,靠买卖圣物来牟利。信仰的衰落还表现在有的俗人担任教职或作修士已不完全是为了信仰,而是基于其他的考虑,且主要是经济上的考虑。各地贵族靠教会职务发财自肥,已是西欧社会不争的普遍事实。因此,对教职的争夺也就愈演愈烈,且手段也极为卑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充分说明了信仰的普遍衰落。而这又是引起广大教徒强烈不满的原因。然而,它却从两个侧面导致了天主教及其组织向文艺复兴的靠拢,其一,信仰的普遍衰落有助于人文主义精神的萌发和成长。因为,教会为了应付自身的信仰危机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放松对新的先进思想的打压,从而为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和传播留下一定的空间。其二,在社会转型冲击下导致的信仰的普遍衰落,迫使天主教会顺应潮流,降低天主教的神圣性,增强其世俗性,以便吸引信徒,克服危机。天主教的世俗化在一定程度上又与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以世俗的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相通。

文艺复兴是西欧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由于社会转型的冲击,观念的世俗化,宗教信仰的普遍衰落,从而导致天主教会不能完全坚守原来的阵地,为了求得生存,天主教会不得不审时度势,对社会现实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社会思潮进行妥协,对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新的社会思潮加以容忍,甚至扶持和奖掖,从而架起了一座由天主教达于文艺复兴的现实桥梁。

三

天主教与文艺复兴运动的薪火传承,还在于两者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思想成果。因此,两者之间,虽然

因为产生的时代不同,社会价值的取向不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观念上的碰撞和对立,但是,两者之间,因种种文化上的原因,必然有着相似、相容和相继的关系。这种相似、相容和相继主要是由如下几个方面导致的。

首先,源于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一定时代的文化总是深深植根于那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之中,是时代的奏鸣曲。这是文化之源。但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上产生的文化,当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存在前提覆灭之后,由于其相对独立性并不会立即消失,尤其是其中的优秀部分,作为人类共同的遗产被后起的文化所吸纳,成为后起的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便是文化发展之流,也是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的主要表现。文艺复兴虽然开启了一个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但决不是与中世纪文化的彻底决裂,而是中世纪文化顺理成章的发展。天主教尤其是修道院在各个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所代表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文艺复兴所涉及的一切文化领域,成为文艺复兴发生的文化前提之一。

同时,天主教作为基督教在西欧的一支,是一种极富包容性的宗教文化体系,是在大量吸收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和哲学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英国学者罗伯逊在《基督教的起源》一书中,论证了希腊化时期的犹太人,是如何在亚历大里亚城以及巴勒斯坦的希腊化城市中接受希腊语言、哲学和文化的过程。到中世纪,许多宗教学者又用希腊哲学和罗马人创造的拉丁语来重新阐释和完善天主教思想。奥古斯丁就是用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进行全面系统的阐发来建造《上帝之城》,完善天主教神学体系的文化功能的。在中世纪占有极其重要的神学学术地位的意大利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代表作《神学大全》,既是当时天主教神学的百科全书,又是整个天主教世界官方思想体系的准确表述和正宗代表。而恰恰该书又是在吸收古希腊罗马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正是由于天主教神学体系中包容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因素,使得以复兴古典文化为旗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能从这里找到契合点,将表面上看来彼此对立的两种文化思想体系,通过古希腊罗马文化沟通起来,而这也正是文化历史继承性的生动体现。

此外,天主教与文艺复兴的传承关系,还在于天主教自身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多种文化汇聚而

成的精神文化的产物,其中含有多元异质的文化因素。派生天主教的基督教,最初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其精神实质应为东方的希伯来文化。而犹太教,又是多元文化汇聚的结果。早在3600多年前,犹太人曾因自然灾害迁居到尼罗河地区,受到了埃及宗教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奥西里斯死后复活,主持冥间审判的传说对于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念和后来基督教的基督复临说准备了原始素材。当公元前586年犹太国被新巴比伦王国所灭,大批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囚”的时期,两河流域的文明和文化同样在他们的宗教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们今天仍能从犹太人的文化典籍汇编《旧约》中看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创世神话和洪水传说,使人们得以窥见犹太——基督教的创世观与古史观的文化渊源。正如有些学者正确指出的那样,公元前538年,当新巴比伦王国亡于波斯帝国以后,返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的羽翼下重建了一个神权统治体制,从而使波斯帝国的国教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中关于主神崇拜、世界末日说和对救世主的企盼的文化观念,被移植到犹太教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犹太教的思想体系。通过与东方多种文化的碰撞和结合,作为东方文化产物的犹太教,就具有了深厚的多元异质文化基因。当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脱颖而出,犹太教的教义成为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的时候,东方多元异质文化的基因就移入到这种新宗教中来了。另外,作为基督教产床的罗马帝国,本来就是一个地跨欧亚非,包含多民族的世界性大帝国,是多种文化的载体,因而东方多元文化的异质特性被新的基督教所吸收应是情理之中了。这种东方古代多元异质的文化因素,虽然在基督教的框架体系中被重新加以解释和说明,变成了宣扬宗教神学思想的依据。但是,这些被汇集到宗教经典中的历史文献,仍不可避免地会发现它的真正价值:即对人的力量、智慧、本性给予肯定的思想。诸如: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传说,就充分表现出摩西对上帝无限崇敬的背后,古代卓越人物优秀的个人品质。在参孙的故事中,就完全体现了古代英雄的力量、智慧和弱点。至于《耶利米哀歌》和《所罗门雅歌》等优秀诗篇,更是人们在面对灾难和爱情时真挚感情的流露,人的真实性的抒发和张扬。《路德纪》中表现的则是人的美好情操,《莎乐美》展示的则是人的欲望和激情。《创世纪》难道不是对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曲折再现?以上表明,作为宗教文化体系的基督教在大肆张扬神学理论的同时,因多元异质文

化基因的作用,而与崇尚人性的世俗文化血脉相连,因不乏古代优秀文化的积淀,而可资新的资产阶级文化借鉴。

最后,天主教文化的世俗性,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文化能从中吸取丰富营养的重要原因。天主教作为一个系统庞杂的宗教神学文化体系,不管表面上表现出与世俗文化多么强烈的对立,然其本质仍未脱离对人的关注。因为任何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只不过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比,是一种颠倒的歪曲的虚幻的反映罢了,其思想之根是深植于社会存在之中的。表面看来,天主教这一文化形态是与以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但实质上,仍然是人面对强大的自然,多灾多难的社会无能为力,而借助于幻想,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神灵并加以顶礼膜拜,然后再来救赎人类的思想意识的反映。恩格斯指出:“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种反映,而在进一步发展中,在不同民族哪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6】(P354)随后,开始仅仅反映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幻象;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了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是抽象的人的反映【6】(P355)。”这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宗教神学观念由自然神论到人格化的神,从多种神崇拜到一神论的发展,恰恰说明神的世界只不过是人的世界的再现而已。

纵观西欧社会的精神和文化发展史,清楚地表现出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在这里,人的本质先是自然力量化,次而神化,进而物化的发展阶段。这一发展过程,正好是人认识自己由低级到高级渐次发展的产物。西欧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神学文化形态,在表面显示与人根本对立的同时,在文化

深层,则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以来最基本的认识模式和思维形式。其内在本质,仍然是对人的关注,是对古代将人的本质和力量对象化为自然力量的一种提升和发展。人在天主教神学那里,实际上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属性,充分表明了随着社会的进步,西欧人日益脱离了自然的羁绊而转向了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人的精神生活的社会目的性进一步增强了。正因为这样,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人文主义思想家只是把矛头指向反动的教会,而不反对天主教本身。他们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中大都从《圣经》和宗教教义中寻找理论根据。许多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大量选取宗教性题材进行艺术创作,表现人文主义思想。这与其说他们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反宗教,倒不如说他们试图挖掘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德国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激烈反对教会的斗争中,上帝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他进行宗教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拂去蒙在天主教教义上的灰尘,以恢复更富于人性更人道化宗教的本来面目。正是由于天主教的世俗精神,给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以斗争的武器和勇气,从而创造出了富于时代气息的资产阶级新文化。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Marvin Perry.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ume,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0.
- [3] Dennis Sherman. For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Mcgraw-Hill, Inc., 1991.
- [4]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5] H·巴隆.法兰西斯派的安贫与市民财富[J].史鉴,13卷(1).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立早

The Renaissance and Catholic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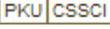
TONG Zi - jue

(Library, Changde Normal University, Changde, 415000 Hunan, China)

Abstract Owing to the tremendous changes of the social reality and various cultural factors, there exist antithesis and confrontation, inheritance and cooperation, variation and heredity among the Renaissance, the Capitalist new culture movement, Catholicism, and the major representative of feudalistic ideology. They have not only an essential distinction but also a clos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the Renaissance; Catholicism; antithesis; realistic background; cultural factors

文艺复兴与天主教

作者: [童自觉](#)
 作者单位: [常德师范学院, 图书馆, 湖南, 常德, 415000](#)
 刊名: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英文刊名: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2, 26(2)
 被引用次数: 2次

参考文献(6条)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2. Marvin Perry [Western Civilization](#) 1990
3. Dennis Sherman [For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1991
4.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1999
5. H·巴隆 [法兰西斯派的安贫与市民财富](#)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5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高焯, SHANG Ye 文艺复兴中的天主教因素 - 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 2007, 20\(2\)](#)

文艺复兴运动从批判天主教的神性、神学入手, 大力提倡人性、理性等世俗化的内容, 以示与天主教的抗争。但看似世俗的文艺复兴中若干思想均来自于传统的天主教的因素, 对人的关注、欲望的放纵、理性的渴求, 以及资料搜集与学术资助的行为, 均在天主教内部予以肯定, 这些都帮助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勃兴。

2. 学位论文 [王宗华 欧洲中世纪晚期《圣经》翻译与基督教传播 2008](#)

中世纪晚期(约14-16世纪), 欧洲进入了一个大震荡、大调整时期。由于长期战乱, 瘟疫流行, 灾害频发, 欧洲庄园和农奴制遭到破坏和瓦解, 封建经济逐步走向衰落; 然而, 广大农奴的解放和自由化为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创造了有利的劳动力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初步发展, 不仅为王权的加强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物质基础, 而且培养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的政治力量——市民阶级。在市民阶级的支持下, 各国王权日益强大, 民族意识也因此不断增强; 到了15世纪末, 英、法、西班牙等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教会也都在王权的控制之下; 德国和意大利虽还没有完成统一, 但国内不断增强的市民阶级力量以及教会的日益腐败促使两国与罗马教廷越走越远。而与此同时, 罗马教会这一欧洲最大的封建主却日益腐化, 不断加重对各国人民的剥削; 罗马教会的贪婪、腐败、虚伪、欺诈与反动遭到天主教内部有识之士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教权逐渐衰落。

文艺复兴, 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与传播, 将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上帝和来世转向人间与现实, 把人们的思想从神学的枷锁和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以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宗教改革, 则直接指向贪婪腐化的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 打破了长期以来天主教大一统的局面, 永久地摧毁了罗马教廷这一凌驾于西欧各国政权之上的国际法庭。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初步发展对天主教神学体系和经院哲学提出了全面的挑战, 不断揭露罗马教会的种种虚假、欺骗的说教; 造纸与印刷等生产技术的进步加快了科学知识和新教思想的传播, 推动了欧洲人民改革和反天主教运动的进程。新航路的开辟, 不仅打开了欧洲人的视野, 使欧洲从此不再封闭; 而且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也激励了人们由专注于神学转向对未知科学领域的积极探索。

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 宗教改革运动的展开, 市民阶级的壮大以及民族意识的增强, “圣经具有最高权威”、“每个人都可以在研读圣经并与上帝直接对话”等基督教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了使更多的老百姓有机会直接阅读《圣经》, 并根据自己的理解领悟《圣经》的真谛, 直接获得上帝的救赎与恩宠, 欧洲各国民族语译经活动日趋活跃。然而, 《圣经》的民族语翻译, 并非一帆风顺, 经历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圣经》是基督教的教义经典, 为了扩大信教群体, 各级教会的宣教人员必须向广大百姓宣传和讲解《圣经》中有关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信仰和伦理观念。但是, 在中世纪, 罗马教会垄断教育, 教士是唯一的知识阶层, 拉丁语是唯一合法的《圣经》语言; 广大普通信徒既不懂拉丁语也不许直接阅读民族语《圣经》, 只能听从教士的宣讲。把持对《圣经》的解释是中世纪天主教会的重要特点; 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与宗教利益, 教会当局往往对《圣经》妄加解释。教廷认为, 民族语的词汇比较贫乏, 不足以用来翻译、解释《圣经》, 反对用民族语翻译《圣经》; 广大普通百姓没有受过教育, 不能完全理解经文, 易导致宗教异端, 反对百姓自己研读和传播《圣经》。对于那些未经教会许可的民族语译经行为往往遭到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 有的译经者遭残酷迫害, 甚至惨遭火刑。然而, 教廷的反对与镇压始终没有能够抑制广大百姓渴望阅读民族语《圣经》的强烈愿望。中世纪晚期, 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波希米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等多种民族语圣经译本仍不断问世。这些民族语译本普遍用词浅显, 通俗易懂, 因而流传甚广, 使更多的老百姓有机会直接阅读《圣经》。广大百姓以《圣经》原文的章句为最高信条, 顺着其章节仔细研读, 用心去理解和感悟上帝的箴言, 并找到了反对教会种种虚说教和世俗统治者一切不合理要求的思想理论武器。

14世纪下半叶, 为了让英格兰人民更多了解《圣经》, 英国著名神学家威克利夫首开整部《圣经》民族语译本的先河, 形成了威克利夫《圣经》。16世纪初, 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受威克利夫和 Huss 基督教活动的激励以及伊拉斯谟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在德国发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为还《圣经》本来面目于民众, 进一步揭露天主教会的欺压, 路德抛弃以往其他译者通常以教廷官方的《武加大圣经》译本为参考的做法, 而溯源至希腊语的《新约》和希伯来语的《旧约》, 以它们为底本, 将《圣经》翻译成浅显易懂的德语, 形成路德《圣经》。威克利夫《圣经》与路德《圣经》是中世纪晚期民族语译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部译本。这两部圣经译本的问世, 不仅促进了各自国家民族文学和语言的发展以及国内广大民众直接研读圣经, 而且影响和推动了欧洲其他民族语译经活动的广泛开展, 加快了宗教改革的进程和新教思想的传播,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文通过对以上欧洲中世纪晚期社会历史背景的回顾和这一时期大量的民族语译经史实的深入考察, 特别是对威克利夫译本与路德译本的全面分析与研究, 揭示了《圣经》翻译与基督教传播之间的内在联系。《圣经》是基督教的载体和教义经典,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流传于世界各地; 在这一过程中, 《圣经》不断被翻译成各种语言; 同时,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或信仰基督教, 《圣经》被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文字。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原有的信教群体, 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基督教的传播进程, 不断扩大其传播范围。可见, 《圣经》的翻译工作非常重要, 它是基督教传播的一项基础性重要工作。欧洲中世纪晚期《圣经》的主要民族语译本都是在基督教革新思想影响和指导下完成的, 通过抄传或出版发行, 以通俗易懂的民族语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信仰和伦理观念广泛传播到欧洲各国, 大大促进了基督教在这些国家与民族内的传播。可以说, 《圣经》的翻译发展史就是一部基督教的传播史。

3. 学位论文 [陈登 利玛窦伦理思想研究——兼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会通 2002](#)

该文试图把利玛窦伦理思想视为中国基督教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西伦理思想交流的重要思想资源。通过对它的研究, 探索中西伦理思想交流史研究的新领域, 进一步丰富对中西伦理思想关系的认识。该研究有助于增进中西学者的相互理解, 以达到学术上的互补。该书本八个部分, 主要内容包括: 绪论: 第一章, 利玛窦伦理思想形成的基础; 第二章, 利玛窦天主教神学伦理观; 第三章, 利玛窦的交往伦理观; 第四章, 利玛窦的其它伦理观; 第五章, 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会通; 结语和参考文献。绪论部分侧重分析了选题的构思、研究目的、学术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的状况, 并简要介绍了利玛窦的生平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该论文第一章概括地分析了利玛窦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思想文化背景; 揭示了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明末社会政治思想氛围对利玛窦的影响; 阐释了利玛窦对异质文化的宽容、重视学习中国文化, 注重学术传教等具有人文主义特点的做法的思想基础, 并对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以及耶稣会对科学的态

度进行了某些有别于中国学术界通行观点的探索性思考,该论文第二章结合利玛窦的天主教神学观比较详细地论述其天主教神学伦理观,该论文第三章围绕着利玛窦的为人之道和交友之道,分析和研究了其人际交往的方式、态度、意图,强调利玛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他高尚纯洁的品德和相须相补的友情,该论文第四章分别讨论了利玛窦的婚姻观、孝亲观、生死观和财富观,分析了这些伦理观与儒家伦理思想的差异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该论文第五章专门讨论了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会通,该论文的结论部分探讨了利玛窦伦理思想的影响、启示和局限。在该书的参考文献中,特意按照中国作者姓氏的拼音的顺序编排了该书参考的主要汉语著作、论文的目录,按照外国作者姓名第一个字母的顺序编排了该书参考的主要外文著作、论文的目录,从文献意义上说,这篇目录为系统地了解利玛窦天主教神学观和伦理观的研究概况提供了基本的线索。

4. 期刊论文 [余祖孝](#) [人文主义者还信仰天主教吗—历史学习](#)2003,“(11)

在教学中,往往注意到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的攻击,错误地认为人文主义者都放弃了天主教,走上了与天主教会决裂的道路。事实上,人文主义者大多是正统的天主教徒,不反对宗教,也不反对罗马教廷对西欧世界至高的统治地位,至少在形式上保持了对教会的忠诚。人文主义者与旧势力有着更多的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系,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艺术大师都是在教廷的庇护下进行着文化的创新活动。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深受阿维农教皇的宠信,享受教会产业的收入。著名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也在教皇尼古拉五世的宫廷供职。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直接为教廷的宗教艺术献出了他们天才的创造力。伊拉斯谟更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宠爱,他与英王亨利八世、德皇查理五世、法王弗朗西斯一世以及一些红衣主教均往来友善。

5. 学位论文 [姚朋](#) [大转折中的猎巫运动](#) 2005

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猎巫运动研究迈进了它的黄金时代。然而,猎巫运动作为“欧洲历史中一个最无法理喻的章节”,它为什么在“理性时代”来临前夕发生以及带来猎巫运动的社会进程和动力机制研究仍然饱受争议,而且,197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部分历史学家的经验式研究使这一困惑更形突出。与此同时,最近十年来,那些主要借助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巫术的学者已经淡出猎巫运动研究。基于大量的一手和二手猎巫运动研究文献,该文的研究方法将是史学式的,并且将摒弃“宏大叙事体”。该文以米歇尔·福柯和费尔南·布罗代尔为榜样,运用他们的“谱系学”和“整体史”研究方法,对猎巫运动的动力本身进行分析,以及分析猎巫运动背后的历史语境。

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学术史,述评和分析自1870年代以来的西方巫术和猎巫运动研究,并且对猎巫运动研究100多年来的主要学者、著作和争论进行分析。

第二部分分析中世纪欧洲的巫术信仰和巫术审判。该文分析了巫术的起源,巫术的种类,以及自《圣经》时代以来天主教会对于巫术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作者认为,巫术信仰和巫术审判在中世纪一直存在,然而,基督教会最早的主要迫害对象并非巫士。

第三部分剖析猎巫运动的迫近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关联。文章认为,巫术信仰在文艺复兴时代“复兴”了,并且在教会和鬼神学家的强调下,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在这个现代化起步阶段,巫术审判的对象越来越针对女巫,换言之,猎巫运动中典型的巫士形象在文艺复兴时代已经成型。与此同时,文艺复兴时代大众和精英对巫术和恶魔法术的关注超越了中世纪以来的任何时段。

第四部分分析宗教改革带来了猎巫运动的高潮。该文认为,无论对于正在改革和现代化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而言,巫士与异端一道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宗教改革后的教义理论以及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的需要将“去魅”和“合理化”放到了中心位置,教义理论强调撒旦在巫士的帮助下与上帝为敌,由此加强了大众普遍的巫术信仰,以及对巫术的恐惧。进而,恶魔化的巫士成了大转折时期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相信巫士对基督教信仰和社会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巨大威胁。作为结果,1570年-1640年猎巫运动高峰期,主要正是社区中的邻居之间存在巫术和恶魔法术的指控。该文认为,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需要为猎巫运动注入了直接的动力。

第五部分剖析猎巫运动的高潮与近代早期经济、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紧密关联。文章认为,在近代大转折早期,在教众的反教权情绪越来越高涨,妇女的职业角色发生转移等等背景下,教会和认信主义国家将巫术审判当作规训大众、迫害和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其目的是加强教会、国家的信仰统一和权威。尤其在近代早期经济困境和生态灾难的大背景下,许多基督徒将他们的苦难归咎于可恨的巫士,而巫士则为他们和社会的种种灾难提供了答案。与此同时,该文认为,当巫术审判和国家的政治整合等等需要吻合的时候,猎巫的烈度就会更高。

作为结论,该文将猎巫运动看成是现代化早期形式的大众癫癲和迫害,看成是大转折和现代化早期激烈阶段的产物。论文认为,猎巫运动满足了处于下降中的教会和处于上升中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种种诉求:维护权威的需要,垄断规范的需要,满足大众不满情绪的需要,政治斗争和迫害的需要等等。换言之,论文旨在展示以宗教改革、政治和社会变迁为标志的大转折与猎巫运动的同步性,进而展示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和诡异性。

6. 期刊论文 [刘丹忱](#) [略论欧洲各国文艺复兴的特点—历史教学](#)2002,“(11)

本文根据史实简要地论述了意大利、德、法、英、西班牙、尼德兰和东欧文艺复兴的一些主要特点,并比较和分析了各国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侧重点及其与天主教、罗马教皇和宗教改革的关系。

7. 期刊论文 [南宮梅芳](#) [NANGONG Meifang](#) [悖论中的妥协——读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语文学刊](#)2008,“(6)

身兼学者和神职于一身的约翰·多恩一方面深受家庭传统的熏陶,在内心深处打下宗教的烙印,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一方面为了实现自己的世俗野心而背叛天主教,皈依英国国教,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改教行为陷入深深自责;他一方面肯定人的情欲,追求肉体欢愉,一方面又不断地反省自我,祈求救赎。这样一种自我肯定和自我弃绝的矛盾贯穿了多恩生活的始终,也正是在对二者的妥协中诗人实现了情爱与宗教的统一。

8. 学位论文 [陈金平](#) [伽利略与天主教会的冲突及其消解](#) 2009

有关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讨论,在现行的文献中人们最常遇到的一种模式是“冲突模式”,即认为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而伽利略案件则常常被作为科学与宗教冲突的毋庸置疑的例证加以阐释。从表面上看,这种看法似乎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事情,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科学是神学的奴仆,它受到自己主人的管束甚至残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科学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成长起来,并变的日益强壮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历史上并非所有的宗教人士都是蒙昧主义者,许多做出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往往具有身份的双重性。事实上,严肃的科学史研究成果表明,科学与宗教之间在过去存在着异常丰富和复杂的关系,以至于很难支持一些一般性的论题。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考察必须伴随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具体的考察。只有考察随同背景一起考察,才能做到考察者所应有的在场性,从而还历史以真相。本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对伽利略案件发生的背景进行了阐释。我们看到,一方面,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将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整个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带入了一个宗教政治上的敏感期,在这样敏感的环境下,科学领域的革新无疑很容易被视作是对宗教上的威胁。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在一个社会里当一种文化占主流时,也就是这种文化已被这一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作为判断的标准时,虽然这种文化无法避免其他非主流文化的侵扰,但这种主流文化也会在批判中显示出强劲的力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略时代,在新时代刚刚起步之际,亚里士多德学说无疑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形态的主流学说。

第二部分则是对伽利略案件发生过程的逐步展开,同时也是对伽利略案件作为科学与宗教毋庸置疑的冲突的例证此一偏见进行的逐步消解。在宗教上的一个如此敏感的时期所发生的悲剧性的事件已不能简单地被看做科学与宗教之间冲突的毋庸置疑的例证,相反,这一毋庸置疑性却大有进一步质疑之处。此部分对伽利略案件作为科学与宗教毋庸置疑的冲突的例证此一偏见进行的消解又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重新考察提供了契机。

第三部分则是跟随这一契机,透过伽利略来对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做初步的探索。对伽利略的有关科学与宗教关系论述的两封信的解读使我们看到:科学与宗教之间这种对立伽利略那里并未发生过。而对伽利略的《对话》中相关论述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就在精神而言,基督教不但没阻碍而且还促成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圣经的因素乃是促进科学生长的“维生素和荷尔蒙”。

9. 期刊论文 [王敏平](#) [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会与文艺复兴关系论—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0,16(3)

对于文艺复兴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已研究了数百年,很多问题已达成共识。但是关于文艺复兴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史学界有过误区,即一贯把天主教会说成是文艺复兴的敌人和对立面。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完全敌对的;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同宗教改革互相促进,前者促进了后者的爆发,后者推动了前者的传播和向纵深发展。另外,不能笼统地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罗马教皇、天主教会的活动及耶稣会都泛称为“反动活动”。事实上,有些教皇如利奥十世等也曾支持文艺复兴运动,并对天主教进行过一些改革。

10. 期刊论文 [海峰](#) [坟墓之上的千年佳奇—科学大观园](#)2009,“(24)

人造奇观

圣彼得大教堂,它巨大的“身躯”横卧在罗马的“城中之城”梵蒂冈境内,高耸的穹顶俯瞰着城市中的芸芸众生。它不仅300多年来保持着世界天主教教堂的规模之最,也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鼎盛成就的辉煌殿堂,是一个西方建筑艺术集大成的工程奇迹,它见证了一个繁荣时代雄心与财富,也用它美轮美奂的外观震撼着每一个参观者。而这伟大教堂诞生的经历,更是别有一番传奇。

引证文献(2条)

1. 卞翠 [浅谈约翰·多恩诗歌中的情爱观](#)[期刊论文]-[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7(3)
2. 黄春高 [2000-2004年中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综述](#)[期刊论文]-[世界历史](#) 2006(3)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tdxshkxxb200202002.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1cb71cb0-0566-4894-b135-9e4d006e30b4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